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OUR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欧洲人权公约》第7条适用指南

法无明文规定不得处罚：罪刑法定原则



出版商或有关组织希望出版或在网上公布（或翻译）本报告的，
请联系 publishing@echr.coe.int ， 咨询相关信息。

© 欧洲理事会/欧洲人权法院, 2016

本指南由专家理事会下属研究及图书资源部提供，对法院没有约束力。指南将于 2016 年 1 月 31 日完成并出版。报告的翻译在欧洲理事会和欧洲人权法院的安排下进行，由中国人民大学全权负责。

本指南可于以下地址下载 www.echr.coe.int (Case-law - Case-Law Analysis - Case-law guide).

关于报告发表的最新动态请关注法院的推特账号<<https://twitter.com/echrpublication>>.

读者须知

本指南是欧洲人权法院（以下简称“本法院”、“欧洲法院”、“斯特拉斯堡法院”）出版的公约指南系列的一部分，旨在让执业律师了解斯特拉斯堡法院作出的基本判决。本指南分析和汇总了截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的关于《欧洲人权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欧洲公约》）第七条的判例法。读者可以从中发现本领域的基本原则和相关判例。

援引的判例法选取了具有指导性的、重要的以及最新的判决。

本法院的判例不仅用于审判呈交至本法院的案件，而且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用于阐释、捍卫和发展《公约》创立的各项规则，并以此促使各缔约国对之加以遵守（*Ireland v. the United Kingdom*, 1978 年 1 月 18 日，§ 154, Series A no. 25.）。因此，从普遍意义来说，《公约》确立的此机制的任务便是通过决定公共政策的各种问题来提升人权保护的标准，并在缔约国范围内推广人权法学（*Konstantin Markin v. Russia* [GC], 30078/06, § 89, ECHR 2012）。

目录

引言	5
I 范围	5
A. “认为有罪”的概念	5
B. 刑事犯罪的概念	5
C. “法律”的概念	6
D“刑罚”的概念	6
1.整体考量	6
2.实体刑法与程序法的区别	8
3.在“刑罚”与“强制施行”之间做出区别	9
4. 与公约的其他规定和议定书的联系	10
II.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原则	10
A.可获得性	11
B.可遇见性	11
1. 总体考虑	11
2.司法解释：关于法律规则的说明	12
3.国家继承的特殊案例	14
4. 国家普遍刑事管辖权的特殊案例及可适用的国家立法	14
III 刑法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则	15
A.总体考虑	15
B.持续犯	16
C.累犯	16
IV.较轻刑罚的溯及力原则	16
V. 第7条第2款：被现代文明国家认可的普遍原则	17
VI. 违反公约第7条的法院所指示的措施	17
援引案例一览	19

引言

《公约》第 7 条——法无明文规定不得处罚

“1. 任何人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在其发生时根据国内法或国际法不构成刑事犯罪的，不得认定其有罪。所处罚金不得重于犯罪时所适用的刑罚。”

2. 如果根据文明国家所认可的一般法律原则，该作为或者不作为在其发生时构成刑事犯罪行为，则本条不得妨碍对该人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进行审判或者予以惩罚。”

1. 第 7 条提供的保障是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根据第 15 条关于战时和公共危机的规定，不得克减第 7 条规定的义务，可见第 7 条在公约的保护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该条应根据其对象和目的加以解释、适用，从而有效防止任意的起诉、定罪和处罚。[\(S.W. v. the United Kingdom, § 34; C.R. v. United Kingdom, § 32; Del Río Prada v. Spain \[GC\], § 77; Vasiliauskas v. Lithuania \[GC\], § 153\)](#)。

2. 第 7 条不仅限于禁止刑法上不利于当事人的溯及既往，同时还表明，只有法律可以定义犯罪并规定相应的处罚(*nullum crimen, nulla poena sine lege*)，此外，刑法还禁止不利于被告的解释，比如类推解释 ([Kokkinakis v. Greece, § 52, Vasiliauskas v. Lithuania \[GC\], § 154](#))。

I 范围

A. “认定有罪”的概念

3. 第 7 条仅适用于当事人“被认定构成”刑事“犯罪”的情况。这不仅包括正在进行的起诉([Lukanov v. Bulgaria, 委员会决定](#))，或者引渡个人的决定([X v. Netherlands, 委员会决定](#))；从公约的目的来看，除非根据法律认为行为违法，否则不能“定罪”([Varvara v. Italy, § 69](#))。

4. 未被“认定有罪”而受到“处罚”的情况，违反了《公约》第 7 条的规定。这是因为，对经审判未被定罪者进行处罚与该条确立的法律原则不相协调([Varvara v. Italy, §§ 61 and 72-73](#))。“刑罚”和“处罚”的理论以及英文中“有罪”的概念和法语中与之对应的“有罪之人”的概念，支撑了对于第 7 条的解释：必须由国内法院认定被指控者有罪，才能将违法行为归因于犯罪者，并对犯罪者施加相应的处罚([Varvara v. Italy, § 71](#)；关于违法行为中对犯罪者犯罪意图的要求，参见 [Sud Fondi srl and Others v. Italy, § 116](#))。

B. “刑事犯罪”的概念

5. 和《公约》第 6 条中的“刑事指控”概念一样，“刑事犯罪”(法语版对应词为“*infraction*”)的概念也有自治的意思¹。恩格尔等人诉荷兰案 ([Engel and Others v. Netherlands, § 82](#)) 确立

¹关于第 6 条（犯罪方面）的范围和“刑事指控”的概念，参见第 6 条（犯罪方面）指南第 6 到 10 页，法院官网可以获取(<www.echr.coe.int> – Case-law)。

了三项标准(之后在 [Jussila v. Finland](#) [GC], § 30 中再次得以重申), 用于判断一项指控是否属于第6条规定的“刑事”指控, 这些标准同样应当适用于第7条([Brown v. United Kingdom](#) (dec.)):

- 国内法上的分类;
- 犯罪行为的性质(最重要的标准, [Jussila v. Finland](#) [GC], § 38);
- 相关行为人可能遭受的处罚的严重程度

6.在适用这些标准时, 本法院认为, 根据第6条与第7条的立法目的, 违反军纪不属于“犯罪”的范围([Çelikates and Others v. Turkey](#) (dec.)). 同样的情形还包括: 解雇、限制雇佣前苏联保安部门代理人 ([Sidabras and Džiautas v. Lithuania](#) (dec.)); 学生在学校违纪([Monaco v. Italy](#) (dec.), §§ 40 and 68-69); 以及对共和国总统明显违反宪法的弹劾程序([Paksas v. Lithuania](#) [GC], §§ 64-69)。本法院认为, 缺少“违反刑法”这一要件的控诉不符合公约规定的属事管辖权。

C. “法律”的概念

7.第7条所使用的“法律”(法语对应词为“droit”)的概念与公约其他条文中所确立的这一概念一致, 既包括国内立法和判例法, 也包括对于法律性质上的要求, 尤其是可获得性和可预见性([S.W. v. United Kingdom](#), § 35, [Del Río Prada v. Spain](#) [GC], § 91)。法律不仅包括制定的法律([S.W. v. United Kingdom](#) §§ 36 and 41-43), 同时也包括法规和位阶低于法规的法令(比如监狱规则, 见[Kafkaris v. Cyprus](#) [GC], §§ 145-146)。本法院必须把国内法视作整体并将其运用于诉讼期间([Kafkaris v. Cyprus](#), § 145; [Del Río Prada v. Spain](#) [GC], § 90)。

8.另一方面, 与现行的成文法规定相矛盾的国家实践以及立法本应依据但却缺乏实质内容的“法律”, 不属于第7条所指的“法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实施边界警戒的做法, 明显违反其自身的法律体系和基本权利, 见[Streletz, Kessler and Krenz v. Germany](#) [GC], §§ 67-87; 还有明显违反前捷克斯洛伐克的相关立法和宪法而进行审判, 之后施行死刑, 从而消除共产党政权的对手的做法, 参见 [Polednová v. Czech Republic](#) (dec.))。

9.第7条第1款中“国际法”的概念是指相关国家签署的国际条约([Streletz, Kessler and Krenz v. Germany](#) [GC], §§ 90-106), 以及国际法惯例(关于国际法以及战争惯例, 参见: [Kononov v. Latvia](#) [GC], §§ 186, 213, 227, 237 and 244; 关于“反人道罪”的概念, 参见: [Korbely v. Hungary](#) [GC], §§ 78-85; 关于“种族灭绝”的概念, 参见: [Vasiliauskas v. Lithuania](#) [GC], §§ 171-175 and 178), 以及相关的尚未正式公布的法律, 参见: [Kononov v. Latvia](#) [GC], § 237)。

D“刑罚”的概念

1.整体考量

10.《公约》第7条第1款确立的“刑罚”的概念在范围上具有自主性。为了确保此条确立的保护机制的效力, 本法院必须能够透过表象, 自主判定一项具体措施是否实际构成第7条

第1款意义上的“刑罚”。要判断某项争议措施是否构成“刑罚”，第一步是要查明该措施是否是在认定行为人构成“刑事犯罪”的基础上而采取的。其他的因素也可能与这方面有关：争议措施的性质和目的（尤其是其惩罚性目的）；国内法上的分类；与其采用和实行相关的程序以及措施的严厉程度。（[Welch v. the United Kingdom](#) , § 28, [Del Río Prada v. Spain](#)[GC], § 82）。但是措施的严厉程度本身并不具有决定性，因为许多预防性的非刑罚措施也会对相关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Del Río Prada v. Spain](#)[GC]; [Van der Velden v. Netherlands](#)(dec)）。

11.在适用这些标准时，本法院特别指出，以下措施应当视作“刑罚”：

- 根据认定有罪之后的刑事诉讼程序而颁布的没收令，鉴于其惩罚性目的及其预防性和赔偿性，应当视作“刑罚”（[Welch v. the United Kingdom](#), §§ 29-35,毒品走私诉讼程序中进行的没收）；
- 因违约而采取羁押措施，从而确保那些不能证明自己破产的债务人履行支付罚金的义务，这种羁押措施应当视作“刑罚”（[Jamil v. France](#), § 32）；
- 在一件关于城市发展的案件中，对违章建筑施加了与其等值的罚金，具有惩罚性和预防性功能，应当视作“刑罚”（[Valico SLR v. Italy](#) (dec.))；
- 刑事法院在宣告无罪后没收建有违法建筑的土地，具有惩罚性目的，同时旨在防止违法行为再次发生，因此属于预防性和惩罚性措施，应当视作“刑罚”（[Sud Fondi srl and Others v. Italy](#) (dec.); [Varvara v. Italy](#), §§ 22 and 51, 根据法规的限制性规定做出中止的决定后发布的没收令）；
- 因严重违法而定罪之后，审判庭采取的预防性拘留措施，考虑到其预防性和惩罚性，而且是在普通监狱里执行，还没有期限限制，应当视作“刑罚”（[M. v. Germany](#), §§ 123-133; [Jendrowiak v. Germany](#), § 47; [Gliem v. Germany](#), §§ 120-130; 反例：[Bergmann v. Germany](#), §§ 153-182, 考虑到原告正在专家中心接受治疗，对其进行预防性拘留）；
- 用驱逐以及为期10年的禁止居住措施替代有期徒刑，应当视作“刑罚”（[Gurquchiani v. Spain](#), § 40）；
- 国内法院命令永久性禁止从事相关职业，作为二次处罚，这种禁止命令应当视作“刑罚”（[Gouarré Patte v. Andorra](#), § 30）。

12.反之，以下情形被排除在“刑罚”的概念之外：

- 对没有刑事责任的人施加的预防性措施（包括强制性的收容治疗）（[Berland v. France](#), §§ 39-47）；
- 出于预防和羁押的目的，对性犯罪或暴力犯罪者进行的治安登记或司法登记（[Adamson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Gardel v. France](#), §§ 39-47）；
- 当局对定罪之人进行的DNA鉴定（[Van der Velden v. Netherlands](#) (dec.))；

- 为防止个人参与非法活动而进行的拘留([Lawless v. Ireland \(no. 3\)](#)), § 19);
- 刑法定罪后禁止居住(在监禁刑之外另行实施), 这项禁止令相当于公共命令措施([Renna v. France](#), Commission decision; under the criminal head of Article 6 § 1, [Maaouia v. France](#)[GC], § 39) (细节略有变更);
- 行政性的驱逐令或禁止居住([Vikulov and Others v. Latvia](#) (dec.); [C.G. and Others v. Bulgaria](#) (dec.));
- 根据欧洲委员会《被判刑人移管公约》附加议定书, 将被判刑的人员移交至其他国家, 该项措施旨在帮助被判刑人更好地重新融入其原籍国社会([Szabó v. Sweden](#) (dec.);被判刑人根据关于欧盟逮捕令的欧盟框架决定进行的自首以及成员国之间的自首程序, [Giza v. Poland](#) (dec.),§ 30);
- 针对涉嫌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实施的预防性财产没收令, 不以刑法上的定罪为先决条件([M. v. Italy](#), Commission decision);
- 旨在防止刑事违法犯罪, 针对危险人物实施的警察监督或者监视居住([Mucci v. Italy](#), Commission decision; [Raimondo v. Italy](#), § 43, as regards the criminal aspect of Article 6 § 1);
- 在刑事诉讼中针对第三方的没收令 [Yildirim v. Italy](#) (dec.); [Bowler International Unit v. France](#), §§65-68);
- 撤回议员的议会授权以及因政党的解散而宣告议员失去任选资格([Sobaci v. Turkey](#) (dec.);
- 因总统严重违反宪法而按照弹劾程序对其进行弹劾, 并宣告其不能胜任总统([Paksas v. Lithuania](#) [GC], §§ 65-68);
- 依照纪律性程序暂停公务员领取养老金的权利([Haioun v. France](#) (dec.));
- 单独关押三个星期([A. v. Spain](#), Commission decision; [Payet v. France](#), §§ 94-100, under the criminal aspect of Article 6);
- 由于申诉人是监狱唯一的犯人, 导致了犯人的社会隔离。本法院认为这项措施过于特殊, 因此不能合理期待国家提供相关立法细节([Öcalan v. Turkey \(no. 2\)](#), § 187)。

2. 刑法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区别

13.本法院指出, 《公约》第7条有关溯及力的规则只适用于有关违法行为及相关惩罚的规定。原则上, 这些规则并不适用于程序法, 但本法院认为, 如果在程序法中直接

适用这些规则不违背法不溯及既往原则，那么也是可取的。(*Scoppola v. Italy (no. 2)* [GC], § 110, 参考与《公约》第6条相关的案件：例如, *Bosti v. Italy* (dec.), § 55, 与目击者陈述的使用相关的规则，被称为“程序性规则”), 不过这种适用也不能任意而为 (*Morabito v. Italy* (dec.)). 如果一项规定在国内法上被划分为程序性规定会影响施加刑罚的严厉程度，那么本法院就会将这项规定划分为“刑法实体法”，对其可适用第7条第1款最后一句的规定(*Scoppola v. Italy (no. 2)*[GC], §§ 110-113, 涉及刑事诉讼法典中关于简易程序中施加刑罚的严厉程度的规定)。

14.关于法令的特殊限制，本法院认为，第7条并不禁止在正在进行的诉讼过程中直接适用延长限制期限，这一情形下所指称的违法行为并不受到限制(*Coëme and Others v. Belgium*, § 149), 而且在这一情形下也不存在任意专断 (*Previti v. Italy* (dec.), §§ 80-85)。因此本法院将有关期限限制的规则划分为程序法，因为这些规则并没有规定违法和犯罪，而且可以解释为，为审查案件提供了简单的前提。(*Previti v. Italy* (dec.), § 80; *Borcea v. Romania* (dec.), § 64)。另外，在国际法框架下，个人被指控的犯罪具有可罚性时，可适用的诉讼时效必须在相关国际法实际生效的期间内(*Kononov v. Latvia* [GC], §§ 229-233, 本法院认为，相关的生效国际法在生效期间并没有指定战争罪的诉讼时效，因此针对申诉人的起诉并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对比 *Kolk and Kislyiy v. Estonia*(dec.) 与 *Penart v. Estonia* (dec.),本法院认为反人类的犯罪并不受条文的限制)。

3.必须区别“刑罚”与刑罚的执行

15.本法院在构成“刑罚”的措施与与实施”与“执行”刑罚相关的措施之间进行了区分。如果采取的措施在性质和目的上涉及判刑的减轻或者假释程序的变更，那么该项措施就不属于第7条意义上的“刑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关于同意减刑,参见 *Grava v. Italy*, § 49, 以及 *Kafkaris v. Cyprus*[GC], § 151; 关于假释条件的立法修正案, 参见 *Hogben v. United Kingdom*, Commission decision, 以及 *Uttley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各类不同的移管判刑者案件中，假释相关规定的不同, *Ciok v. Poland*(dec.), §§ 33-34)。与释放政策、其实施的方式以及所依据的理由等相关的问题，属于成员国自行决定其刑法政策的权力范围(*Kafkaris v. Cyprus* [GC], § 151)。对于在第7条范围内，定罪已经成为最终判决的也不能适用特赦法(*Montcornet de Caumont v. France* (dec.))。

16.然而，在实践中，构成“刑罚”的措施与有关刑罚“执行”的措施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明显。比如，本法院认为，针对所涉刑罚对关于加强判刑的监狱规章进行解释和实施的的方式明显超出了执行的范围，因此实际上已经属于判刑的范畴 (*Kafkaris v. Cyprus* [GC], § 148, 关于无期徒刑)。同样，刑罚执行法院依据在申诉人犯下罪行后才生效的法律，延长预防性拘留的时间，构成了“额外的刑罚”，因此并不仅仅涉及刑罚的执行 (*M. v. Germany* § 135)。

17.在这方面，本法院强调，第7条第1款第2句中使用的“施加”一词，不能解释为被排除在宣判刑罚后采取措施的范围之外(*Del Río Prada v. Spain*[GC], § 88)。因此，如果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或法院在刑罚已经实施完毕或正在实施之时采取的措施导致初审法院施加的“惩罚”的范围被重新定义或修改，那么这些措施应当属于《公约》第7条第1款刑罚溯及既往有关规定的范围(*Del Río Prada v. Spain*[GC], § 89)。为了确定在执行刑罚时采取的措施是否只涉及刑罚执行的方式，还是同时也影响了刑罚的范围，本法院必须在每一个案中考察在现行的国内法中施加的“刑罚”所实际包含的内容，换言之，

考虑其内在的本质是什么(*Del Río Prada v. Spain*[GC], § 90)。本法院认为减刑体系的新的适用方法,已经导致刑罚范围被重新定义,因为新的适用方法对被判刑人的处罚进行更改产生了影响(*Del Río Prada v. Spain*[GC], §§ 109-110 and 117,根据判例法中的撤销制度,对于三十年的有期徒刑,无法针对已经拘留的部分进行减刑)。

4. 与公约的其他条文以及议定书的联系

18. 《公约》第7条的目的为“惩罚”,除与第6条第1款刑事部分和“刑事指控”概念具有明显联系之外(参见本适用指南第5段;同时参见 *Bowler International Unit*, §§ 66-67), , 也与第7议定书第4条确立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有关(*Serquei Zolotoukhine v. Russia* [GC], §§ 52-57, 关于刑事诉讼的概念)。关于什么构成“刑罚”,在公约不同条文之间不应有所差别(*Göktan v. France*, § 48; 同时参见,《公约》第6条的刑事部分与第7议定书第2条中提到的“刑事犯罪”的概念之间的关系, *Zaicevs v. Latvia*, § 53)。

II. 罪刑法定原则

19. 《公约》第7条要求判刑或者施加刑罚要有法律依据。因此,本法院必须确认,当被告实施导致他被诉并被定罪的行为时,应当有现行法律规定该行为可罚,同时施加的惩罚不得超过该法律规定的限度(*Coëme and Others v. Belgium*, § 145; *Del Río Prada v. Spain* [GC], § 80)。

20. 鉴于公约体系的附属性质,处理国内法院认定事实或适用法律的错误不属于本法院的职能,除非该错误侵犯了公约保护的权利和自由。(*Streletz, Kessler and Krenz v. Germany* [GC], § 49; *Vasiliauskas v. Lithuania*[GC], § 160), 或者国内法院作出的判定是明显任意专断的 (*Kononov v. Latvia*[GC], § 189)。即使不要求本法院对罪行的法律分类或申诉人的个人刑事责任进行规制,这也是国内法院审查案件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Kononov v. Latvia*[GC], § 187; *Rohlens v. the Czech Republic* [GC], § 51), 第7条第1款要求本法院审查对申诉人定罪是否具有现行法上的依据,而且国内法院达成的结果应符合《公约》第7条的规定。减弱本法院的审查权力,将会违背公约第7条的目的(*Rohlens v. the Czech Republic* [GC], § 52; *Kononov v. Latvia*[GC], § 198; *Vasiliauskas v. Lithuania* [GC], § 161)。

21. 此外,罪刑法定原则排除了对被告人实施比他所犯罪行更重的刑罚。因此,考虑到申诉人所遭受的刑罚属于由国内法院评估的可以减轻的情形,本法院可以认为,国内法院在确定刑罚的严重程度时出现的错误违反了第7条(*Gabbari Moreno v. Spain*, §§ 22-34)。通过类推施加刑罚,也违反了第7条规定的“法无明文规定不得处罚”原则(*Baskaya and Okçuoğlu v. Turkey*[GC], §§ 42-43, 根据适用于主编的规定,对出版商施加刑罚)。

22.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犯罪和相应的刑罚由法律明确规定(参见本适用指南第7至第9段关于“法律”的概念)。“法律”的概念在第7条中的含义与在公约其他条款(例如第8到11条)中一样,提出了性质上的要求,特别是可获得性和可预见性(*Cantoni v. France*, § 29; *Kafkaris v. Cyprus* [GC], § 140; *Del Río Prada v. Spain* [GC], § 91; *Perinçek v. Switzerland*[GC], , § 134)。不论是违法行为的定义(*Jorgic v. Germany*, §§ 103-114), 还是违法行为必须接受的惩罚或其范围,都必须满足这些性质上的要求(*Kafkaris*

[v. Cyprus](#) [GC], § 150; [Camilleri v. Malta](#), §§ 39-45, 适用的量刑标准的可预见性, 完全取决于检察官对于审判法院的选择, 而不是根据法律所规定的标准)。如果涉及违法行为的定义以及适用的刑罚的“法律质量”不达标, 就会构成对《公约》第7条的违反([Kafkaris v. Cyprus](#) [GC], §§ 150 and 152)。

A. 可获得性

23. 关于可获得性, 本法院应查明定罪所依据的刑事法律对于申诉人来说能否获得, 也就是说该法律是否已经公开(解释部分法律的国内判例法的可获得性, [Kokkinakis v. Greece](#) § 40, 以及 [G. v. France](#), § 25; “执行令”的可获得性, [Custers, Deveaux and Turk v. Denmark](#)(dec.), § 82)。如果定罪纯粹是以应诉国签署的国际条约为依据, 那么本法院就需要确认该条约是否被吸收进国内法之中, 还要确认是否发行在官方出版物上。

(关于《日内瓦公约》, 参见[Korbely v. Hungary](#) [GC], §§ 74-75)。本法院也可以依据国际惯例, 来评估犯罪定义的可获得性(在1948年通过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生效之前, 联合国大会谴责灭绝种族罪的决议, [Vasiliauskas v. Lithuania](#) [GC], §§ 167-168; 依据有关战争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这些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并没有发行在官方出版物上, 同时对犯罪定义的可获得性和可预测性进行考察, [Kononov v. Latvia](#) [GC], §§ 234-239 and 244)。

B. 可预见性

1. 总体考量

24. 任何个人必须能够从相关条款的措辞以及, 在必要情况下通过法院的解释和适当的法律建议, 来得知何种作为或不作为会让他承担刑事责任, 以及会相应地受到何种处罚([Cantoni v. France](#), § 29; [Kafkaris v. Cyprus](#) [GC], § 140; [Del Río Prada v. Spain](#) [GC], § 79)。“适当的建议”意指获得法律建议的可能性([Chauvy and Others v. France](#) (dec.); [Jorjic v. Germany](#), § 113)。

25. 由于条文具有一般性, 其措辞不是绝对精确的。为了避免法条过度刚性, 确保法条的内涵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保持同步, 很多法律都会不可避免地有着或多或少的模糊性, 这些规定的解释和适用都取决于实践的需要([Kokkinakis v. Greece](#), § 40, “改信宗教”的违法行为的定义; [Cantoni v. France](#), § 31, “医学产品”的法律定义)。在使用分类立法技术时, 对法律概念的定义就经常会存在灰色地带。如果能证明边缘事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足够清楚, 那么其不确定性本身并不会使得条文规定与《公约》第7条不一致([Cantoni v. France](#), § 32)。另一方面, 在解释法律规定时, 使用过于模糊的概念和准则, 会使得规定本身不符合清晰度和可预见性的要求([Liivik v. Estonia](#), §§ 96-104)。

26. 可预见性概念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涉法律文书的内容、计划涵盖的领域以及目标对象的数量和地位([Kononov v. Latvia](#) [GC], § 235; [Cantoni v. France](#), § 35)。即使在一定情形下相关人会通过适当的法律咨询去评估一个特定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 法律仍然有可能满足可预见性的要求 ([Cantoni v. France](#))。这一点对于那些从事专业性活动的人来说尤为突出, 他们在进行自己的职业活动时保持着高度谨慎, 因此在评估这些活动所带来的风险时, 就需要特别注意([Cantoni v. France](#); [Pessino v. France](#), § 33; [Kononov v. Latvia](#) [GC], § 235)。例如, 本法院认为, 超市经理能够获得适当的法律建议,

应该认识到非法销售药物产品有被起诉的风险([Cantoni v. France](#) § 35)。对于下列有关个人的定罪，本法院也持类似观点：一家香烟销售公司的经理在香烟盒上印上了违法的短语([Delbos and Others v. France](#)(dec.)); 一家视听公司的发行经理，通过一份“在发布给公众之前已经确定的”声明公开诽谤一名公务员([Radio France and Others v. France](#), § 20); 一家销售食品补充剂的公司经理销售的产品含有法律禁止的添加剂([Ooms v. France](#) (dec.)); 一本书的作者和出版商进行公开诽谤([Chauvy and Others v. France](#) (dec.)), 出版社的专业地位要求它应该提醒作者被起诉的风险); 律师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作为被领养儿童的中间人进行代理([Stoica v. France](#) (dec.)), 该人是家庭律师); 绿色和平组织积极分子非法进入格陵兰岛的军事防御区([Custers, Deveaux and Turk v. Denmark](#) (dec.)), §§ 95-96); 那些曾因主使东德谋杀案(这些被害者于1979年至1989年间试图穿过两德边界逃离东德)被定罪的政客们, 之后在东德的国家机关位居高职 ([Streletz, Kessler and Krenz v. Germany](#) [GC], § 78); 1972年, 东德边境警卫杀害了一名试图穿过两德边界的人, 尽管他是在执行上级命令([K.-H.W. v. Germany](#) [GC], §§ 68-81); 苏联军队的一名指挥官带领一支“红色游击队”讨伐二战的奸细, 其中的风险本应该被精细评估([Kononov v. Latvia](#)[GC], §§ 235-239)。至于士兵个人的刑事责任, 本法院认为, 对于那些不仅公然违反国内法, 还公然侵犯国际公认的人权(特别是生命权, 即人权在国际层面的最高价值体现)的命令, 士兵不能全盘地、盲目地服从([Kononov v. Latvia](#)[GC], § 236; [K.-H.W. v. Germany](#) [GC], § 75)。

27. 可预见性必须从被定罪之人在犯下被指控之罪时的角度来评价(很有可能是在被定罪之人获得了法律建议之后) ([Del Río Prada v. Spain](#)[GC], §§ 112 and 117, 申诉人被定罪时, 即实施犯罪行为后, 所施加处罚的范围发生变更的可预见性)。

28. 如果定罪是完全基于国际法或者国际法原则, 本法院会根据诉讼期间国际法适用的标准, 来评估定罪的可预见性, 所依据的国际法包括国际条约(在涉及有关东德的问题时适用《公民政治及国际权利公约》, [Streletz, Kessler and Krenz v. Germany](#) [GC], §§ 90-106; 1948年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Jorgic v. Germany](#), § 106), 和国际惯例(1953年, 国际惯例关于灭绝种族罪的定义, [Vasiliauskas v. Lithuania](#) [GC], §§ 171-175; 1944年的《战争法律和惯例》, [Kononov v. Latvia](#) [GC], §§ 205-227; 禁止在国际冲突中使用芥子气的国际惯例, [Van Anraat v. Netherlands](#) (dec.)), §§ 86-97)。

2. 司法解释：关于法律规则的说明

29. 在任何法律体系中, 无论法律规定有多么明确, 都需要进行司法解释。国内法院的裁判角色就是用来解决这种解释中存在的疑惑([Kafkaris v. Cyprus](#) [GC], § 141)。通过司法立法来推动刑法的发展, 是公约缔约国的法律传统中固有的、必要的一部分。《公约》第7条不能被解读为禁止通过个案中的司法解释来逐步明确刑事责任规则, 因为对于法律内容的司法解释与法律对于犯罪的规定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并且能够合理预见([S.W. v. the United Kingdom](#), § 36; [Streletz, Kessler and Krenz v. Germany](#) [GC], § 50; [Kononov v. Latvia](#) [GC], § 185)。

30. 司法解释的可预见性与犯罪构成([Pessino v. France](#), §§ 35-36, [Dragotoni and Militaru-Pidhorni v. Romania](#), §§ 43-47)和适用刑罚都有关系([Alimuçaj v. Albania](#), §§ 154-162; [Del Río Prada v. Spain](#)[GC], §§ 111-117)。如果本法院认为定罪或犯罪缺乏可预见性, 就不能再去评判施加的刑罚是否符合第7条所要求的由法律规定([Plechkov v. Romania](#), § 75)。严格程序事项的解释对犯罪的预见性没有影响, 因此不会涉及有关第7条的问题(主张在起诉原告时遇到了程序上的困难, [Khodorkovskiy and Lebedev](#)

[v. Russia](#), §§ 788-790)。

31. 关于国内司法解释与犯罪本质的相容性，本法院必须通过上下文确定解释是否与所涉刑事法律规定的措辞相一致，以及是否合理(关于灭绝种族罪，[Jorgic v. Germany](#), §§ 104-108)。

32. 关于司法解释的合理预见性，本法院必须评估申诉人当时是否可以——如有必要，在律师的协助下——合理地预见被指控和定罪并受到相应处罚的风险([Jorgic v. Germany](#), §§ 109-113)。本法院必须确定刑事司法解释是否只是延续可预见的判例法的发展([S.W. v. the United Kingdom](#) 以及 [C.R. v. the United Kingdom](#), 两名妇女，分别遭遇丈夫强奸和强奸未遂。本法院指出，强奸对被害人人格的贬损性显而易见，因此英国法院的决定是可预见并且符合公约的基本目标的，“公约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尊重人的尊严和自由”），或者国内法院是否采取了一种申诉人无法预见的新的方式([Pessino v. France](#), § 36; [Dragotoni and Militaru-Pidhorni v. Romania](#), § 44; [Del Río Prada v. Spain](#), §§ 111-117)。评价一项司法解释的可预见性时，缺乏可比较适用的先例对于判断结果并不具有决定性([K.A. and A.D. v. Belgium](#), §§ 55-58, 本法院认为因施虐导致实际身体伤害罪是极不正常的暴力行为; [Soros v. France](#), § 58)。当国内法院首次解释某一刑法规定时，如果对罪行范围的解释与该罪的本质相一致，就应当将其视作一项规则，认为其具有可预见性([Jorgic v. Germany](#), § 109, 申诉人是第一个被依据刑法典认定犯灭绝种族罪的人)。如果根据国内法规定以及行为的本质，对于现行犯罪行为范围的新解释是合理的，那么这一解释就符合第7条目的所要求的可预见性(对于“逃税”这一概念的新解释，[Khodorkovskiy and Lebedev v. Russia](#), §§ 791-821, 本法院认为，刑法中关于税收的规定可以足够灵活，以适应新的情况，并具有可预见性)。

33. 尽管本法院会考虑当时对于法律的原则性解释——尤其是当这一解释与司法解释相一致时([K.A. and A.D. v. Belgium](#), § 59; [Alimucaj v. Albania](#), §§ 158-160), 即使立法者已经解释过条文，也不能代替判例法([Dragotoni and Militaru-Pidhorni v. Romania](#), §§ 26 and 43)。

34. 尽管在一定的情形下，长期容忍某种行为可能会使得这些行为在某些案例中实际上刑事化——这些行为本来是可能受到刑事处罚的，不能仅仅因为其他人没有被起诉或定罪，就免除被判刑申诉人的刑事责任，也不能因此认为定罪不符合《公约》第7条目的所要求的可预见性([Khodorkovskiy and Lebedev v. Russia](#), §§ 816-820)。

35. 在解释基于公开的国际法制定的法律条文时，国内法院必须确定在国内法中适用哪种解释，这一解释应当与违法行为的实质相一致，并在诉讼期间具有可预见性(德国法院对于灭绝种族罪采取了一个较为宽泛的解释，之后这一解释就被其他国际法院所否决，比如联合国国际法院，[Jorgic v. Germany](#), §§ 103-116)。

36. 本法院认为，(恶意地)对刑法作出不利于被告的扩张性解释，根据不可预见的判例法的撤销作出解释([Dragotoni and Militaru-Pidhorni v. Romania](#), §§ 39-48)，以及通过类推作出与犯罪行为实质不一致的解释([Vasiliauskas v. Lithuania](#) [GC], §§ 179-186, 灭绝种族罪的定罪)，都不符合可预见性的要求。这也有可能与国家依据犯罪之后新增的判例法对犯罪行为定罪相违背(从外部协助及教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Contrada v. Italy \(no. 3\)](#), §§ 64-76)。

37. 陪审团负责考虑案件、适用刑法，这并不意味着法律的效力不符合第7条目的所要求的可预见性([Jobe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如果足够明确地规定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及其行使方式，充分保护个体免于任意性的专断，那么授予陪审团关于具体案件法律适用的自由裁量权并不违背公约的要求([O'Carroll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陪审团对于猥亵的构成要件的认定)。

3. 国家承继的特殊情况

38. 司法解释的概念适用于民主法治国家判例法的逐步发展，在国家承继的情况下，也同样有效。在一国领土上国家主权变更或国家政体变更的事件中，本法院认为，一个法治国家对那些在前一政体统治期间犯罪的人提起刑事诉讼是合法的；同样，这种由新政权取代旧政权的国家中的法院，在诉讼期间根据法治国家所遵循的法律原则，对现行法律规定进行应用和解释，这是不应该被批判的(*Streletz, Kessler and Krenz v. Germany* [GC], §§ 79-83; *Vasiliauskas v. Lithuania* [GC], § 159)。特别是当存在争议的问题涉及生命权时，这一权利是公约和人权在国际层面的最高价值体现，缔约方对其具有首要的保护义务(*Kononov v. Latvia* [GC], § 241)。一国容忍或鼓励被国内法或国际法视为刑事犯罪的行为，使得犯罪之人认为可以免受处罚，这并不妨碍他们接受审判和惩罚(*Vasiliauskas v. Lithuania* [GC], § 158; *Streletz, Kessler and Krenz v. Germany* [GC], §§ 74 and 77-79)。本法院认为，对杀害1979年至1989年间试图穿过两德边界逃离东德的人的东德政治领袖和边境警卫的定罪是可预见的，这一定罪已经由重新统一后的德国法院基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立法作出宣判(*Streletz, Kessler and Krenz v. Germany* [GC], §§ 77-89; *K.-H.W. v. Germany* [GC], §§ 68-91)。关于二战期间苏军指挥官战争罪行的认定，也可以得出一致的结论，在拉脱维亚1990和1991年宣告独立后，拉脱维亚法院对其罪行作出了宣判(*Kononov v. Latvia* [GC], §§ 240-241)。

39. 本法院还认为，尽管在诉讼期间立陶宛还没有被认可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根据重新恢复独立的立陶宛共和国的法律进行定罪，是可充分预见的，并且符合《公约》第7条的规定(*Kuolelis, Bartosevicius and Burokevicius v. Lithuania*, §§ 116-122,对在1991年1月参与颠覆与反政府活动的苏联共产党立陶宛分支领导人进行定罪)。

4. 国家普遍刑事管辖权的特殊情况及可适用的国内法

40. 以一国国内法为依据进行定罪，可能涉及犯罪嫌疑人在另一国的犯罪行为(*Jorgic v. Germany; Van Anraat v. Netherlands* (dec.))。一国国内法院的域外或普遍管辖权问题并不属于第7条所规定的范围(*Ould Dah v. France* (dec.))，而属于如《公约》第6条第1款及第5条第1款第a项所规定的依法建立的国内法院或审判庭的权利(“由有管辖权的法院判决后对被定罪之人的合法拘留”) (*Jorgic v. Germany*, §§ 64-72,对在波黑发生的灭绝种族行为的定罪)。

41. 一国的国内法院基于普遍刑事管辖权宣判一个人有罪时，可根据《公约》第7条审查国内法的适用是否损害罪行发生地所在国的法律。例如，在一个由法国法院(基于《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对在毛里塔尼亚实施酷刑和暴行的毛里塔尼亚官员进行定罪的案件中，本法院认为，适用法国刑法对毛里塔尼亚特赦法的损害(已在所有的刑事程序前颁布)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Ould Dah v. France* (dec.))。在这方面，本法院认为，“如果国家只能行使司法管辖权而不能适用法律，那么禁止酷刑和起诉违反普遍规则之人的绝对必要性以及缔约国基于《联合国反酷刑公约》所具有的普遍管辖权，将丧失其本质。为了维护犯罪发生地所在国为保护其公民而通过的决定或特殊法案，而认为行使普遍管辖权的国家法律不能适用，或者是，受到犯罪者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为了使其免罪而适用行使普遍管辖权的国家的法律，这些毫无疑问都会使普遍管辖权的行使机制趋于瘫痪，同时也违反《联合国反酷刑公约》所追求的目标”。本法院重申禁止酷刑在所有有关人权保护的国际文书中处于很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

III 刑法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则

A. 总体考虑

42. 第7条无条件禁止刑法不利于被告的溯及既往的适用(*Del Río Prada v. Spain* [GC], § 116; *Kokkinakis v. Greece*, § 52)。刑法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则不仅适用于对违法行为的定义(*Vasiliauskas v. Lithuania* [GC], §§ 165-166)，同时也适用于犯罪行为带来的刑事处罚(*Jamil v. France*, §§ 34-36; *M. v. Germany*, §§ 123 and 135-137; *Gurquchiani v. Spain*, §§ 32-44)。甚至是在已经判处最终刑罚之后或正在执行刑罚之时，法不溯及既往的规定也排除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国内法院对所判处的刑罚作出不利于被告的重新定义或修改(*Del Río Prada v. Spain* [GC], § 89，根据判例法撤销一个30年监禁的判决，对于已拘留的刑期不能有效适用减刑，而当申诉人犯下罪行时，最高法定刑被视为一个新的、独立的判决，此时可以对已拘留的刑期适用减刑)。

43. 对在相关规定生效之前发生的行为适用该规定，违背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该原则禁止将现有的罪行范围扩大到以前未被规定为刑事犯罪的行为。然而，如果根据当时可适用的刑法典，该行为就已具有可罚性，则不违反第7条的规定——即使他们只是作为一个加重情形具有可罚性，而不是一个独立的违法行为——(*Ould Dah v. France* (dec.))，只要所判处的刑罚不超过该刑法规定的最高刑)或者是基于当时可适用的国际法对申诉人定罪(*Vasiliauskas v. Lithuania* [GC], §§ 165-166, 国内法院根据1953年生效的国际法对申诉人定罪，本法院处理这一问题时指出，国内法院溯及既往地适用了2003年立陶宛法律关于种族灭绝的规定; *Šimšić v. Bosnia and Herzegovina* (dec.))，1992年实施的反人类罪)。在后一种情况下，尽管相对于国际法，国内法上往往会采取一种更加广泛的定义（参见本适用指南第35段），他们无法在重新定义之前行为的基础上，溯及既往地适用刑罚(*Vasiliauskas v. Lithuania* [GC], § 181，根据2003年刑法典对灭绝种族的行为进行定罪，而该刑法典涉及的是1953年针对政治组织成员实施的行为)。

44. 关于刑罚的严重程度，本法院对犯罪判处的刑罚不能比犯罪时可适用的刑罚更重。有关处罚适当性的问题不属于公约第7条讨论的范围。决定监禁的期限以及对于特定违法行为施加刑罚的类型并不是本法院的职能(*Hummatov v. Azerbaijan* (dec.); *Hakkar v. France* (dec.); *Vinter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105)。然而，可以根据《公约》第3条考察刑罚的合比例性问题(*Vinter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 102，“明显不合比例的惩罚”的概念)。

45. 关于刑罚的严重或严厉程度，本法院已经规定，判处终身监禁并不比死刑更重，然而后者可以在行为人实施犯罪时适用，但随后已被废除并被终身监禁取代(*Hummatov v. Azerbaijan* (dec.); *Stepanenko and Ososkalo v. Ukraine* (dec.); *Öcalan v. Turkey (no. 2)*, § 177)。

46. 在确定是否存在任何不利于被告的溯及既往的刑罚适用时，必须注意在每部刑法典中可适用的量刑标准（法定最高刑和最低刑）。例如，即使对申诉人判处的刑罚同时处于两部可适用的刑法典的范围内，如果原本可根据其中一部刑法典所规定的更轻的法定最低刑做出一个更轻的判决，而国内法院并没有依此对被告判处更轻的刑罚，那么就违反了第7条的规定 (*Maktouf and Damjanović v. Bosnia and Herzegovina* [GC], §§ 65-76)。

B.持续犯

47.对于“持续”或“继续”的罪行（涉及一段时间内持续的行为），本法院认为，根据法律确定性原则，导致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的要素，应在起诉书中予以明确。此外，国内法院作出的决定也必须明确，对被告人的定罪和判决是基于在起诉中已经确立“持续性”行为的构成要件([Ecer and Zeyrek v. Turkey](#), § 33)。最近，本法院认为，国内法院根据修改后的刑法典对个人的违法行为定罪，同时对在修改生效之前实施的并且被国内法认定为“持续性的”犯罪行为进行定罪，这并不属于不利于被告的溯及既往的刑法适用([Rohlena v. the Czech Republic](#) [GC], §§ 57-64,对同居者实施的虐待行为)。本法院指出，在所涉及的国内法中，“持续”的罪行被认为构成了一个单一的行为，由于在旧法施行期间实施的行为在旧法中也具有可罚性，因此在对该罪行进行刑法分类时，必须根据在犯罪行为最后一次发生并完成时有有效的法律加以考察。此外，由于在原告实施第一次行为之前，连续犯的概念已被引入刑事法典，因此国内法院根据国内法对持续犯概念加以适用也就具有可预见性([Rohlena v. the Czech Republic](#) [GC], §§ 60-64)。本法院还认为，根据“持续”犯罪的分类对申诉人判处的刑罚，不会比在对申诉人立法修改之前及之后实施的行为分别进行评价时可能判处的刑罚更加严厉(参见上例, §§ 65-69)。

48.相反地，如果依据当时有效的国内法，对持续的罪行定罪是不可预见的，而且还导致加重了对申诉人判处的刑罚，那么本法院会认定为刑法被溯及既往地适用且不利于原告([Veeber v. Estonia \(no. 2\)](#), §§ 30-39; [Puhk v. Estonia](#), §§ 24-34)。

C.累犯

49.申诉人之前在刑法上的身份在之后被审判庭和上诉法院纳入考虑范围，这是由于其在1984年的定罪被保存在犯罪记录中，鉴于被起诉和惩罚的犯罪行为是在新法生效后发生，这一新法中延长了可能构成累犯的期限，本法院认为，审判庭和上诉法庭的做法并不违反第7条的规定([Achour v. France](#) [GC], §§ 44-61,国内法院直接适用了新的刑法，新的刑法规定在十年的期限内均有可能构成累犯，而在申诉人实施第一次违法行为时，有效的旧法典规定的期限是五年，根据申诉人的主张，在五年期满时，他便享有“被遗忘”的权利)。这种溯及既往的方法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溯及既往的概念。

IV.较轻刑罚的溯及原则

50.尽管《公约》第7条第1款并未明确提及较轻刑罚的溯及原则（不同于《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5条第1款及《美洲人权公约》第9条做出的细致规定），但本法院认为，第7条第1款不仅能保障更严厉的刑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也含蓄地表明，溯及适用更宽松的刑法的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为，当犯罪行为实施时有有效的法律与行为发生之后最终判决做出之前制定生效的法律之间存在差别时，国内法院必须适用对被告人最有利的法律规定([Scoppola v. Italy \(no. 2\)](#) [GC], §§ 103-109,判处30年的监禁而非死刑)。本法院认为，“仅因为在实施犯罪时已规定刑罚而判处该较重的刑罚，意味着适用不利于被告的刑法在时间上的延续性的规则。此外，这相当于无视任何有利于被告的可能发生在定罪之前的立法变化，并继续施加处罚，而国家及其所代表的共同体现在

会觉得这些刑罚过于严重” (*Scoppola v. Italy (no. 2)* [GC], § 108)。本法院指出，在欧洲和国际上逐渐出现了一个共识，认为适用提供了更宽松处罚的刑法——甚至于这一刑法是在违法行为实施之后才颁布，已成为刑法的基本原则(*Scoppola v. Italy (no. 2)* [GC], § 106)。

51. 即使在斯科珀拉诉意大利案 (*Scoppola v. Italy (no. 2)* [GC]) 中，本法院并没有明确支持任何有利于被定罪之人的立法变化的溯及力效果，但本法院确实对定罪之人适用了更轻刑罚的溯及力原则，因为国内法律明文要求，当之后的法律减轻了适用于犯罪行为的处罚时，国内法院应当审查因职权判处的刑罚 (*Gouarré Patte v. Andorra*, §§ 28-36)。本法院认为，如果国家在其法律中明文规定更为有利的法律的溯及力原则，就必须允许其公民在与公约一致的范围内行使该权利(*Gouarré Patte v. Andorra*, § 35)。

V. 第7条第2款：文明国家所认可的一般法律原则

公约第7条第2款

“…

2. 如果根据文明国家所认可的一般法律原则，该作为或者不作为在其发生时构成刑事犯罪行为，则本条不得妨碍对该人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进行审判或者予以惩罚。”

52. 从《公约》的筹备文件可以看出，第7条第1款可以看作是有关法不溯及既往的一般原则，而第7条第2款则只是对该原则的责任部分的阐明，因此确保在二战后起诉二战期间的罪行的有效性是毋庸置疑的(*Kononov v. Latvia* [GC], § 186; *Maktouf and Damjanović v. Bosnia and Herzegovina* [GC], § 72)。这也表明，公约的订立者并非允许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的一般例外。事实上，本法院在一些案件中指出，第7条的两款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并且应当结合起来解释(*Tess v. Latvia* (dec.); *Kononov v. Latvia* [GC], § 186)。

53. 根据这些原则，在对1992和1993年发生于波斯尼亚的战争罪进行定罪时(*Maktouf and Damjanović v. Bosnia and Herzegovina* [GC], §§ 72, 其中，政府主张，根据“文明国家认可的一般法律原则”，被指责的行为属于犯罪，不能适用禁止溯及既往的原则)，以及在对1953年实施的灭绝种族行为进行定罪时(*Vasiliauskas v. Lithuania* [GC], §§ 187-190)，本法院排除了第7条第2款的适用。关于对二战期间实施的战争罪行的定罪，本法院认为，考虑到申诉人的行为从第7条第1款的意义上来说构成了“国际法”上的犯罪，因此没必要根据第7条第2款来对这些罪行进行评价(*Kononov v. Latvia* [GC], §§ 244-246, 参考了国际惯例，尤其是《战争法律和惯例》)。

VI. 本法院在违反《公约》第7条的案件中所指示的措施

54. 根据《公约》第46条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缔约国都应遵守本法院的最终判决，并由部长委员会监督执行。本法院认为被诉国违反本公约或其议定书时，被诉国不仅应通过满足条件的方式向相关人支付款项（《公约》第41条），同时也要在部长委员会的监督下，在其国内法律秩序中采取普遍性措施或个别性措施（如果恰当）来杜绝本法院所认定的违反公约的行为，并尽可能地纠正其影响。此外，应诉国仍然可以自由选

择其履行第46条所规定义务的方式，只要履行方式与本法院判决得出的结论是相一致的即可([Scozzari and Giunta v. Italy](#) [GC], § 249)。

55. 然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为了帮助被诉国履行第46条规定的义务，本法院可能会对用以杜绝违反公约行为的个别性措施或普遍性措施作出一些指示。在违反第7条的案件中，出现例外情形时，本法院有时会中对可行的个别性措施作出指示：根据申诉人的要求重新启动国内诉讼程序([Dragotoni and Militaru-Pidhorni v. Romania](#), § 55, 在个人被指控违反《公约》第6条时适用了同样的规则)；在尽可能早的日期释放申诉人([Del Río Prada v. Spain](#)[GC], § 139, **实施中的第3号规定**，被认为违反了《公约》第7条以及第5条第1款)；或要求应诉国根据较轻刑罚的溯及力原则，用不超过三十年的有期徒刑取代申诉人的无期徒刑([Scoppola v. Italy \(no. 2\)](#)[GC], § 154 , **执行中的第6条规定第a款**)。

援引案例一览

本指南援引的判例法涉及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或裁定以及欧洲人权委员会的决定或报告。

除非另行指明，所有参考皆是本法院审判庭依法作出的判决。缩写“(dec.)”是指该处援引为本法院裁定，“[GC]”是指该案件由大审判庭审判。

本指南电子版中援引案例的超链接直接跳转 HUDOC 数据库 (<<http://hudoc.echr.coe.int>>)。该数据库提供本法院（包括大审判庭、审判庭和委员会的判决、裁定和相关案例、咨询意见以及案例法信息注解中的法律总结）、委员会（决定和报告）和部长委员会（决议）的判例法。

本法院以英语和/或法语这两种官方语言发布判决和裁定。HUDOC 也包含许多重要案例的近 30 种非官方言语的翻译，以及由第三方制作的大约 100 个在线案例汇总的链接。

—A—

[A. v. Spain](#), no. 11885/85,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3 October 1986
[Achour v. France](#) [GC], no. 67335/01, ECHR 2006-IV
[Adamson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no. 42293/98, 26 January 1999
[Alimuçaj v. Albania](#), no. 20134/05, 7 February 2012

—B—

[Başkaya and Okçuoğlu v. Turkey](#) [GC], nos. 23536/94 and 24408/94, ECHR 1999-IV
[Bergmann v. Germany](#), no. 23279/14, 7 January 2016
[Berland v. France](#), no. 42875/10, 3 September 2015
[Borcea v. Romania](#) (dec.), no. 55959/14, 22 September 2015
[Bosti v. Italy](#) (dec.), no. 43952/09, 13 November 2014
[Bowler International Unit v. France](#), no. 1946/06, 23 July 2009
[Brown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no. 38644/97, 24 November 1998

—C—

[C.G. and Others v. Bulgaria](#) (dec.), no. 1365/07, 13 March 2007
[C.R. v. the United Kingdom](#), 22 November 1995, Series A no. 335-C
[Camilleri v. Malta](#), no. 42931/10, 22 January 2013

[Cantoni v. France](#), 15 November 1996, Reports of Judgments and Decisions 1996-V
[Çelikateş and Others v. Turkey](#) (dec.), no. 45824/99, 7 November 2000
[Chauvy and Others v. France](#) (dec.), no. 64915/01, 23 September 2003
[Ciok v. Poland](#) (dec.), no. 498/10, 23 October 2012
[Coëme and Others v. Belgium](#), nos. 32492/96 and 4 others, ECHR 2000-VII
[Contrada v. Italy \(no. 3\)](#), no. 66655/13, 14 April 2015
[Custers, Deveaux and Turk v. Denmark](#) (dec.), nos. 11843/03 and 2 others, 9 May 2006

—D—

[Del Río Prada v. Spain](#) [GC], no. 42750/09, ECHR 2013
[Delbos and Others v. France](#) (dec.), no. 60819/00, ECHR 2004-IX
[Dragotoniu and Militaru-Pidhorni v. Romania](#), nos. 77193/01 and 77196/01, 24 May 2007

—E—

[Ecer and Zeyrek v. Turkey](#), nos. 29295/95 and 29363/95, ECHR 2001-II
[Engel and Others v. the Netherlands](#), 8 June 1976, Series A no. 22

—G—

[G. v. France](#), 27 September 1995, Series A no. 325-B
[Gabarri Moreno v. Spain](#), no. 68066/01, 22 July 2003
[Gardel v. France](#), no. 16428/05, ECHR 2009
[Giza v. Poland](#), no. 48242/06, 13 July 2010
[Glien v. Germany](#), no. 7345/12, 28 November 2013
[Göktan v. France](#), no. 33402/96, ECHR 2002-V
[Gouarré Patte v. Andorra](#), no. 33427/10, 12 January 2016
[Grava v. Italy](#), no. 43522/98, 10 July 2003
[Gurguchiani v. Spain](#), no. 16012/06, 15 December 2009

—H—

[Haioun v. France](#) (dec.), no. 70749/01, 7 September 2004
[Hakkar v. France](#) (dec.), no. 43580/04, 7 April 2009
[Hogben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11653/85, Commission decision of 3 March 1986,
Decisions and Reports 46
[Hummatov v. Azerbaijan](#) (dec.), nos. 9852/03 and 13413/04, 18 May 2006

—J—

[Jamil v. France](#), 8 June 1995, Series A no. 317-B
[Jendrowiak v. Germany](#), no. 30060/04, 14 April 2011
[Jobe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no. 48278/09, 14 June 2011
[Jorgic v. Germany](#), no. 74613/01, ECHR 2007-III
[Jussila v. Finland](#) [GC], no. 73053/01, ECHR 2006-XIV

—K—

[K.-H.W. v. Germany](#) [GC], no. 37201/97, ECHR 2001-II (extracts)
[K.A. and A.D. v. Belgium](#), nos. 42758/98 and 45558/99, 17 February 2005
[Kafkaris v. Cyprus](#) [GC], no. 21906/04, ECHR 2008
[Khodorkovskiy and Lebedev v. Russia](#), nos. 11082/06 and 13772/05, 25 July 2013
[Kokkinakis v. Greece](#), 25 May 1993, Series A no. 260-A
[Kolk and Kislyiy v. Estonia](#) (dec.), nos. 23052/04 and 24018/04, 17 January 2006
[Kononov v. Latvia](#) [GC], no. 36376/04, ECHR 2010
[Korbely v. Hungary](#) [GC], no. 9174/02, ECHR 2008
[Kuolelis, Bartosevicius and Burokevicius v. Lithuania](#), nos. 74357/01 and 2 others,
19 February 2008

—L—

[Lawless v. Ireland \(n° 3\)](#), 1 July 1961, Series A no. 3
[Liivik v. Estonia](#), no. 12157/05, 25 June 2009
[Lukanov v. Bulgaria](#), no. 21915/93,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2 January 1995, Decisions and Reports 80-A

—M—

[M. v. Germany](#), no. 19359/04, ECHR 2009
[M. v. Italy](#), no. 12386/86, Commission decision of 15 April 1991, Decisions and Reports 70
[Maaouia v. France](#) [GC], no. 39652/98, ECHR 2000-X
[Maktouf and Damjanović v. Bosnia and Herzegovina](#) [GC], nos. 2312/08 and 34179/08, ECHR 2013 (extracts)
[Monaco v. Italy](#) (dec.), no. 34376/13, 8 December 2015
[Montcornet de Caumont v. France](#) (dec.), no. 59290/00, ECHR 2003-VII
[Morabito v. Italy](#) (dec.), no. 58572/00, 7 June 2005
[Mucci v. Italy](#), no. 33632/96, Commission decision of 4 March 1998

—O—

[O'Carroll v. the United Kingdom](#), no. 35557/03, 15 March 2005
[Öcalan v. Turkey \(no. 2\)](#), no. 19681/92, 5 June 2001
[Ooms v. France](#) (dec.), no. 38126/06, 25 September 2009
[Ould Dah v. France](#) (dec.), no. 13113/03, ECHR 2009

—P—

[Paksas v. Lithuania](#) [GC], no. 34932/04, ECHR 2011 (extracts)
[Payet v. France](#), no. 19606/08, 20 January 2011
[Penart v. Estonia](#) (dec.), no. 14685/04, 24 January 2016
[Perinçek v. Switzerland](#) [GC], no. 27510/08, ECHR 2015 (extracts)
[Pessino v. France](#), no. 40403/02, 10 October 2006
[Plechkov v. Romania](#), no. 1660/03, 16 September 2014
[Polednová v. the Czech Republic](#), no. 2615/10, 21 June 2011
[Previti v. Italy](#) (dec.), no. 1845/08, 12 February 2013
[Puhk v. Estonia](#), no. 55103/00, 10 February 2004

—R—

[Radio France and Others v. France](#), no. 53984/00, ECHR 2004-II
[Raimondo v. Italy](#), 22 February 1994, Series A no. 281-A
[Renna v. France](#), no. 32809/96, Commission decision of 26 February 1997
[Rohlena v. the Czech Republic](#) [GC], no. 59552/08, ECHR 2015

—S—

[S.W. v. the United Kingdom](#), 22 November 1995, Series A no. 335-B
[Serqueï Zolotoukhine v. Russia](#) [GC], no. 14939/03, ECHR 2009
[Scoppola v. Italy \(no. 2\)](#) [GC], no. 10249/03, 17 September 2009
[Scozzari and Giunta v. Italy](#) [GC], nos. 39221/98 and 41963/98, ECHR 2000-VIII
[Sidabras and Džiautas v. Lithuania](#) (dec.), nos. 55480/00 and 59330/00, 1 July 2003
[Šimšić v. Bosnia and Herzegovina](#) (dec.), no. 51552/10, 10 April 2012
[Sobaci v. Turkey](#), no. 26733/02, 29 November 2007
[Soros v. France](#), no. 50425/06, 6 October 2011
[Stepanenko and Ososkalo v. Ukraine](#) (dec.), nos. 31430/09 and 29104/11, 14 January 2014
[Stoica v. France](#) (dec.), no. 46535/08, 20 April 2010
[Streletz, Kessler and Krenz v. Germany](#) [GC], nos. 34044/96 and 2 others, ECHR 2001-II
[Sud Fondi srl and Others v. Italy](#) (dec.), no. 75909/01, 30 August 2007
[Sud Fondi srl and Others v. Italy](#), no. 75909/01, 20 January 2009
[Szabó v. Sweden](#) (dec.), no. 28578/03, ECHR 2006-VIII

—T—

[Tess v. Latvia](#) (dec.), no. 19363/05, 4 January 2008

—U—

[Uttley v. the United Kingdom](#) (dec.), no. 36946/03, 29 November 2005

—V—

[Valico SLR v. Italy](#) (dec.), no. 70074/01, 21 March 2006

[Van Anraat v. the Netherlands](#) (dec.), no. 65389/09, 6 July 2006

[Van der Velden v. the Netherlands](#) (dec.), no. 29514/05, ECHR 2006-XV

[Varvara v. Italy](#), no. 17475/09, 29 October 2013

[Vasiliauskas v. Lithuania](#) [GC], no. 35343/05, ECHR 2015

[Veeber v. Estonia \(no. 2\)](#), no. 45771/99, ECHR 2003-I

[Vikulov and Others v. Latvia](#) (dec.), no. 16870/03, 23 March 2004

[Vinter and Others v. the United Kingdom](#) [GC], nos. 66069/09 and 2 others, ECHR 2013
(extracts)

—W—

[Welch v. the United Kingdom](#), 9 February 1995, Series A no. 307-A

—X—

[X v. the Netherlands](#), no. 7512/76, Commission decision of 6 July 1976, Decisions and
Reports 6

—Y—

[Yildirim v. Italy](#) (dec.), no. 38602/02, ECHR 2003-IV

—Z—

[Zaicevs v. Latvia](#), no. 65022/01, 31 July 2007